

谈《珍本的研究》

费毓龙

数千年来的文史经哲和科学技术之所以能得到留传和传播靠的是书籍。在欧洲，十八世纪中叶，法国版本学家德波（De Bure）的《版本学说明》（*Bibliographie Instructive*）一书问世，从而揭开了对西文书籍研究的序幕。之后，图书馆员、藏书家对书籍的渊源、形成及其对世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和说明。于是欧洲的版本学便日趋完善。时至今日，其研究对象已经超出了图书本身的范围；并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版本学既然如此受到人们的尊重，那么，版本学的特征是什么呢？对此，中文方面已经发表了很多有关著作。外文方面笔者想介绍一本一九三〇年美国丹佛市克莱逊出版社（Denver, The Clason Publishing Co., 1930）出版的美国学者诺利·默密（Nolie Mumey）所著的《珍本的研究》（*A Study of Rare Books*）一书。该书是限定版本，印数不多，距今虽有半个世纪，但是，仍不失为书林中一册极有参考价值的重要著作。《研究》就当代各大图书馆，私人藏书家所藏的各种著名珍本作了解明扼要的介绍。该书的特点是：附有大量的珍本书影以供参考，任何对国外珍本感兴趣的人，读一读此书，都能从中得到入门的启迪。

本书作者曾受业于哈佛大学教授洛布克（W.F. Luebke），作者从事版本研究多年，并有一定的造诣。为了充实和丰富《珍本的研究》的内容，他曾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纽约市公共图书馆等十一所著名的图书馆、私人藏书家、出版单位、社会团体，对他们所

藏的珍本作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并拍摄到不少珍贵的书影。历时数年，终于完成了这一著作。虽然不能说该书是一部全面的综合性著作，可是至少能向专业人员提供不少极有价值的资料；人们不会因其年代久远而认为失却时间效用，相反能开阔视野，在我国的版本园地里会去爱护外文珍本这枝濒临枯萎的花蕾，使她在芳草地上能与群芳一样得到灌溉。

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独自的文化，并且可以追溯各自的文化源头——从游吟诗人到文字记录。西方活字印本问世后，尤其在经过一七九〇年及一八四〇年两次技术革命的书籍来说，人们追溯图书的形成、发展和传播的欲望越来越强烈。对世上所传的古籍总想刨根究底，问个从何而来？谁人所印？何时首印？字体怎样？它的印刷标记（*Device*）是什么？……这种溯本求源的愿望总想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研究》一书或多或少地会解决这一愿望的。默密在《研究》中提供了不少一般人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材料。由于作者对各种版本进行比较认真的研究，所以他选择的材料并不是冷僻的；涉及的古籍珍本，也是一般人所感兴趣的。例如：任何地方都有活字印本，那么，最古老的活字印本是什么样子？图书馆天天接触图书出版目录，那么，最早的外文出版目录又是什么样子？我们今天看到彩色缤纷的儿童读物，可曾想到最早儿童读物有没有今天这样的瑰丽？所有这一切，《研究》一书会给您满足的。当您细细阅读这册《研究》时，您会仿佛置身于荟萃着西方珍本的长廊。在您浏览《伊索寓言》、《汀代尔圣经》、《莎士比

中国“地震学报”初探

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 耿秀英

由中国地震学会主办的“地震学报”，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是地震科研学术活动的窗口，学报所发表的地震科技论文一定程度地反映我国的地震科研动向和学术水平。笔者对“地震学报”近五年（1979—1983年）刊登的学术论文所引用的参考文献按其标志与特征进行了统计分析。得到研究论文引用文献的一些初步结论是：五年内共发表地震科

学学术论文200篇，引用参考文献达1593篇，每篇论文平均引文量为8篇弱；引文中，英文科学论文占44.5%；期刊占80.2%，其中在BSSA、JGR等十种期刊中呈优势分布；引文的时序分布，1970年以前的文献被引频度低，而且分布离散；引文著者被引频度及自引量的统计，表明我国地震科技战线上已经涌现出一批卓越的中青年科学家；引文多

亚著作首印对开本》的书影和介绍时，犹如听到伊索富于哲理的语言，汀代尔在受刑时的呻吟，莎士比亚的娓娓动听、亦庄亦谐的声音。默密的数十幅书影向人们展示了西方五百年源远流长的印刷发展史；清晰地显示了各个时代的每个印刷人的不同字体和他们的印刷标记。不尽如此，从这些书影中还闪烁着中古时代乃至近代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和他们胼手胝足的辛勤创造。

撰写一本版本学的著作，弄不好就会变得晦涩难懂，索然无味。诺利·默密对每一珍本的介绍、名词的解释，都用词简单，文笔流畅，能概括地介绍版本学的全貌。作者还增加了欧洲古今地名表、大事记、版本学的名词解释，以及详尽的书目。全书共分三个部份，对英美文坛巨擘的主要著作的珍本、鲁拜集的版本、医学、圣经等方面的珍贵版本都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尽管如此，默密的《研究》毕竟是一本旧著，并不能反映当前国外最新研究的动态，而且在某些方面还存在着错误。如将唐咸通九年王玠出资雕刻的卷子本《金刚经》误为日本所刻，一千三百页左右的《四十二行圣经》误为六百四十一页，再如《摇篮版》图书的名词是由

谬恩须脱大教堂，教长伯纳·冯·马林考洛特（Bernard von Mallinkrod）于一六三九年在科隆出版的《印刷术的起源及其发展》（*De ortu et progressu artis typographicae*）首先使用的，并非如默密所说是菲利浦·拉蓓（Philippe Labbe）于一六五三年首先使用的。仅举数例，说明默密在考证中尚有不严谨之处。但是瑕不掩瑜，总的来说，在目前所能阅读到的一些版本研究的著作中，它仍不失为一本具有参考价值的案头专著。

读了这本《研究》，联想到近年来中外学者的文化交往越来越多。各国研究对方的文化发展愈显重要，仅就西学东渐及东学西被这两个课题已引起国际上的重视，对原著的需求更是迫切。这就证实了发掘、考证、保护这些受国际上重视的外文古籍已成为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工作，可惜，外文古籍的考证工作由于文字上的隔阂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始终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扶持，其损失是难以估量的。但是笔者深信，王重民、贺昌群等学者在卅年代未竟的工作必将得以继续，不仅“东山再起”并且还会“人才辈出”。